

## ■黃榮村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董事長、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

曾任教育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專業領域為人類知覺、認知科學。

代表著作有《盲點填補效應》、《教育改革：對民主化、社會公義、與競爭力之引申》等書籍。



「我不覺得知識分子消失了，我認為是他們對社會關懷的方式更多元了。」負責籌辦這次研討會的黃榮村說，他在像《中國時報》「民意論壇」這樣的版面上，「還是能夠看到很多學者、或者說知識分子吧，批判時局、提出理念，精采的時論並沒有減少。」

其次，黃榮村觀察到，很多人則是「直接採取了行動」。他說，這幾年，社區營造、環保、生態保育、教育、關懷弱勢、乃至於九二一重建、在SARS後協助建立社區公共衛生體系：等，都有很多人積極的投入，「第一線工作也是一種社會參與」。

不過，黃榮村說他也很認真地思考，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在討論著知識分子影響力不夠的問題，他說，理由可能是，政治鋪天蓋地，如果人們認為某人有某個政治立場，那麼當他發言時，另一個政治立場的人可能就不覺得他是在做一種不帶偏好的公共論述，甚至會認為「他不算知識分子」。

另一方面，黃榮村說，對一些人來說，政黨輪替就是某種民主政治的具體實踐了，「因此對這些年來的時局抱著觀察、了解、期許的時間比較多，嗆聲就變少了。」黃榮村說，也許就是這樣吧，讓人「感覺」到知識分子的「力道」變弱了。

他說，從這種感受，他也體會到原來社會對知識分子是有很高的期許和期待的，總希

望他們「不只是有學問的人，更是有眼光、有智慧、有愛心的人」，可以在對立、混亂時局中，提出社會新的價值、台灣未來的願景；黃榮村相信，現在知識分子可以表達意見的領域更多、更廣了，「戒嚴時期，知識分子都可以做那麼多事，何況現在，知識的領域更寬、關注的對象更多，可以發揮的地方不是更多了嗎？」

黃榮村希望，在經過政治上的吵吵鬧鬧之後，大家可以學習到一件事情，就是把台灣重新放回兩岸、亞洲、世界的架構裡來看，而不要只是關起門來看台灣，「因為那會把台灣的路走窄、走險了，相信這不會是大家所想要看到的。」而要能這麼做，很重要的前提是，「我們可以對不同意見、不同立場的人，懷抱更多耐心和同理心，了解到社會本來就是由不同的人構成的。」

黃榮村舉了這次陽明山會議為例說，雖然與會的人大都彼此相識，但畢竟還是有觀點不同的人，因此，會議除了建立交換意見的平台和討論的氛圍，「還有一點很重要，是要建立一種『態度』，就是相信別人說的話是出自他自己真誠的相信，並沒有惡意，因此應該予以尊重」。平台、氛圍加態度，三樣缺一不可，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會議激盪出美好的火花，黃榮村說：「這讓我相信，知識分子的火苗不但沒有熄滅，而且可以燒得更旺。」

# 公民培育與讀書人的分寸

——黃榮村

## 台

灣社會教育文化的演進，一直在兩條軸線編織的網格中擺盪。就橫切面看，全球化與在地化是同一球面的兩端，台灣必須在全球論述、亞洲論述、與在地論述上，找到位置。就縱切面看，台灣又必須在歷史軸線上交待定位並發展台灣論述。台灣在過去一百來年中經歷過很多人還記憶猶新或正在進行中的殖民經驗、去威權與民主化、全球化、以及在地化的四重糾葛。再看過去六十年，台灣至少見證過下列三件事：

- (一) 從壓制到解除管制：社會力的解放；
- (二) 在野勢力的興起：政治行為的解放；
- (三) 成就、自信、與自主：思考格局與個人實踐的解放。因此，台灣開始具體而微的在社會中表現多元、去威權、去歷史負擔、務實、自信自主的特質。但在這段期間，「歷史——自主論證大移位」(The Great History-laden vs. Autonomy Shift) 也在隱然成形，兩岸分治下的統獨爭議及其變形議題愈來愈多，現在還在尋找最大公約數的過

程中擺盪。但是，不管台灣經驗有多寶貴，台灣還是無法關起門來走完全程，因為全球化的壓力近十年來可說是戰鼓頻催，逼迫著台灣一起與國際同步思考，甚至在教育文化部門與人才培育上，都要被放到國際平台上一齊競爭。

在此交織的架構下，衍生出兩大主題。一為在這種脈絡下發展與變遷的台灣社會，如何培育公民的議題；另一為在此脈絡中，讀書人如何自處並掌握分寸的議題。

## 壹、公民培育

一、台灣社會要永續發展，首需培育具有競爭力的國民。以今日國際互動之頻繁與互相依賴及競爭而言，所謂競爭力當然要定位在國際架構上。依此而言，則要學習的是人類過去重大的知識遺產與當代重要的知識產出；同時要習得所謂「學習如何學」(learning to learn)的態度與技巧，以及發展多元創意的特色。就這幾項而言，國際化當然比在地化更為重要，而且要優先看待。這就是所謂的回歸基本面(back to basics)。我國高等教育走的大體上是這條路，雖然有的走得不太好，但不會有太多爭議；反觀中小學教育，雖有識之士也是如此看法，但卻走得辛苦，因為很多人都想強加自己的價值在年輕人的培育過程之中。譬如政經社會文史的了解，本就應該加強由近

及遠、略古詳今的原則，也應強調對重大事項之了解與演進，但涉及史觀及詮釋觀點，則宜由民間在其不同版本中去斟酌考量，行政力量不宜過度涉入，至於追究責任則是成人世界的事，等弄定了再考量放入學習過程。教育主管部門與社會大眾更宜關切結構面問題，諸如城鄉與貧富差距、M型教育、教育資源的籌措與分配、遊戲規則（如辦學目標與實踐），至於內容則宜放手由專業與學校來自主主導，這才是回歸教育基本面的作法。

在培育具有競爭力國民的過程中，有一些問題需提出討論。我們一直興致勃勃的宣稱中學生在TIMSS（國際數學與科學成就調查）、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與國際Olympiad上的成就，但很少嚴肅看待並檢討下列問題：

- （一）過去對教改的不當論斷，以及對九年一貫課程與建構數學的過度批評。
- （二）有城鄉與貧富差距的學業成就。
- （三）小學時的多元創意逐漸窄化成中學的學業成就。
- （四）與國際四、五十個國家比較，國中生的數學與科學成就都在前五名（甚至前三名），但也表現出沒什麼真正的興趣，認同亦低，啟蒙過程顯然延後。這些問題反應的是教育政策的可延續性、社會公平正義、多元創意發展的隱憂、與卓越之可延續及發展性，我們不能不正視這些問題，並進而尋求解決方案。

二、當代的公民培育還有一環是教養層面，這才是真正應該做好在地化的課題。在

行為上學好應對進退，遵守必須的法律與倫理準則，是最基本的要求。在理念上，學習如何具有人文關懷的心胸，照顧弱勢，具有同理心，是知易行難的事，但人才培育本來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台灣社會更需協助學習者如何平衡理智與情感。我們這個社會有太多情感性的議題，需要在人才培育過程中給予正確的教導，包括有如何提升對人類與同胞苦難的體認與敏感度、對社會公平正義不可遏止的關切。另外，我們經常處於不確定狀態中，如何做好判斷與選擇？這些不確定狀態經常涉及濃厚的情緒（如焦慮、恐懼、憤怒），如統獨爭議、歷史詮釋、反核與擁核，學習者若在培育過程中，未能學到如何容忍不明確、尊重別人感情、做延遲判斷的能力與態度，則經常會陷入雙峰穩定結構，隔著山頭叫罵。處理不確定狀態下的決策，往往需要在多重判準中取得共識，才有均衡解，但是若學習過程缺乏上述的元素，將難以用喊話的方式來達成協議。

教育部門已研議品德教育方案（或者也可稱之為教養方案），但仍無可替代過去品德教育及四維八德的教育目標與方式。我們有藝術教育白皮書，學童也開始多才多藝，但顯然仍欠缺藝術教養及品味，也未能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往往講的一篇好道理，但缺乏實踐，又兼校園內與社會上的role model功能日益式微，因此所謂教養教育祇得其形未得其髓，未能發揮真正的教育成效。同樣的現象也在高教中複製，專業訓練尚具效果但通識精神之培育難謂成功；研究與教學有進步，但評鑑指標繁多，大家在此



日益狹窄的指標架構中，逐漸迷失教育本質，對人類知識未知領域之投入日益迴避，對量化的追逐遠過於對影響力的重視。

三、縱上所述，在全球化壓力下，強調多元競爭力的培育是一條不歸路，但社會制約太多，校園仍未真正獲得解放，自主辦學還未理想。在地化與本土化可以強調，但應與國際化取得協調，且應居於輔助地位，不宜凌駕，教育主管單位也不宜過度介入主導。至於教養教育是可以大力在地化本土化的部分，但目前反而流於形式，教育文化的本質尚未獲彰顯，亟待教育主管部門加一把力。

由此看來，競爭力人才培育與教養教育雖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叉影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顯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也許我們應該積極促成以此兩者為主軸的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好好的把未來十年該做的事鋪陳出可有效促進的藍圖，這才是開大門走大路的作法。

## 貳、讀書人的分寸

接續教養問題的討論，在當代台灣社會的變遷過程中，讀書人如何自處並掌握分寸，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受到重視的「本土化」議題，也應該在本土化與在地化的基礎上

多加討論，但這種看法並不表示就不需考量國際在特定時空背景下，讀書人如何自處與進行批判的經典案例。

當我們討論讀書人應表現的教養時，顯得比討論學生的教養更為沈重，因為會涉及更多學術與政治的分際。談讀書人的教養，首先會碰到所謂的 *decency* 與 *integrity* 之表現，這兩種特質都會被放在關鍵事件中予以檢驗，往往涉及貫穿一生的評價。另外，讀書人的分寸也經常表現在對社會集體記憶之解釋與批判上，大家想知道的是這個讀書人，是否具有無偏的眼光、是否表裏一致、是否始終如一（當然容許合理或具說服力的修正）、是否在關鍵時刻具有勇氣。或許比較苛求的是，讀書人的自處與分寸掌握，是否真的站在對的一方，而且對國家社會的未來做出正面貢獻。

這種分寸的拿捏其實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我們經常處在不確定的狀態下。但正也因為這樣，讀書人的分寸與判斷，才具有啓蒙的作用。如由讀書人組成的民間論政社團，假如它確實是出自專業與良心的組合，則其唯一應該做的就是 *anti-establishment*，除此無它，因為要做好這件事大概就要付出全部的心力，何況還不一定能做好。*Anti-establishment* 並非祇要是既有體制或當權者所做的都要反對，而應是針對如 Lord Acton 所指稱的『*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之敗德的權力結構。民間論政成員應有銳利的眼光與使命感，不讓黑暗帝國的教父橫行，不讓國民成為

黑暗海洋中漂浮的卒子，這就是讀書人的分寸。

但是，我們也很難理解一個讀書人能夠在隔夜之中，就成為以上所談能夠掌握分寸的人物，除非他本身就已經是一位具有競爭力與真正接受過良好教養教育的人。當然，一位不是讀書人的公民也能表現出上述的特質，假如他有另外值得珍視的人才培育過程。這樣看來，讀書人分寸的養成，顯然也與良好的公民培育息息相關。假如我們覺得讀書人的自處與分寸，對當代社會的正面演進有重要影響，則國家人才培育的促進方案，真的值得大家給予更多的重視。

